

共话行业新风向

陆家嘴论坛求解热门议题新方案

6月20日，在2024陆家嘴论坛的最后一天，论坛邀请了来自全球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的高层领导、财经界领袖以及著名专家学者，围绕银发经济与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创新与治理、建设高质量普惠金融体系等多个议题展开讨论，就养老产业盈利困难、科技监管难题、普惠金融瓶颈等多个颇受社会关切、亟待着手解决的行业难题给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与思路。

● 本报记者 魏昭宇



视觉中国图片

推进养老金融稳步发展

在本次陆家嘴论坛的“银发经济与养老金融”会议上，多位业内权威人士围绕改善养老产业盈利水平、完善个人养老金制度等话题展开了探讨。

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执行董事谷澍指出了银发经济面临的几点普遍性困境。比如，养老产业的普惠性经营主体多数面临着如何实现盈利、如何取得担保的难题。再比如，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大量县域人口迁移，转化为新市民，但与之配套的养老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供给相对薄弱。“养老金金融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大家合力打造完善的服务生态，将难点变成亮点。”

谷澍认为，在融资服务供给方面，银行业

要尽量做好“三个融合”：把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好，围绕银发经济产业链的关键节点和上下游链条企业培育优势主体，拉长做深金融服务链条；把信贷、投资、金融租赁等综合化服务能力融合好，多维度、多层次满足市场主体的需求；把养老机构建设过程中的财务表现评价和发展潜力的评估融合好，引导信贷资源更多向养老产业倾斜。

从保险业的角度出发，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赵永刚认为，要继续丰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供给，助力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目前来看，养老必将慢慢从过去的靠国家向靠社会、靠个人转变，因此推动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是当前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首要任务。”

赵永刚表示，相对银行理财、基金储蓄等其他金融产品，保险产品在长寿风险管理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其专业价值不可替代。

此外，在制度建设方面，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裁蔡希良提到，要着力提升第二、第三养老支柱的吸引力。“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三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但是目前来看，三个支柱的发展并不平衡。若能大力提升第二、第三支柱的吸引力与覆盖面，便能切实解决养老金储备不足的问题。”蔡希良提议，可以在提升企业年金职工参保率、适度提升个人养老金税优额度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切实提升居民参与第二、第三支柱的积极性，为有效增加养老金储备创造更好的条件。

平衡数字金融创新与治理

在数字金融强国的建设背景下，数字金融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但在创新的同时，不少数字金融服务或产品也可能带来一定治理风险，如何实现创新与治理之间的平衡，成为业内关切的问题。

在此次会议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董事长宋曙光从公司数字化转型之路中体悟到：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手段的转变，更是金融模式、组织形态的系统性变革。因此，对金融机构来说，首先要充分挖掘数据要素价值，实现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的跃升；其次要运用数字技术、数字思维改革和重塑金融服务的全流程；最后要加快建立适应技术进步快速创新的体制机制。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董事长张为忠亦提到了数据在数字金融转型中的重要性。“以浦东发展银行现在的转型为例，我们如今在做的供应链金融、普惠金融、跨境金融、财资金融等业务，都是通过数字化模式进一步重塑和

改写。它的内部机理除了对信用进行洞察分析，有效的客户触达之外，如何进行价格判断？如何进行产品和资源的匹配？这都需要依靠数据说话。”

“但是，数字金融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挑战。”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赵鹏表示，就保险而言，最突出的就是如何保障公平性的问题。他表示，传统保险经营的原则是大数法则，保险定价是大众化的公平定价，集中体现保险“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风险共担本质。但是进入数字化时代，随着互联网设备的普及、大数据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的应用，保险公司的风险识别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可以采取更精准、个性化的定价，从而实现“千人千面、千人千险”。这有利于提高保险经营效率，进而提高保险覆盖面。但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个性化的保险定价，可能导致部分弱势群体保费过高，可能无法通

过保险进行风险转移，从而造成新的风险排斥。

“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好把握数字金融创新与治理的关系。既要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服务效率，也要防范技术不当应用影响社会公平。尤其避免大数据以及算法的歧视，造成弱势群体因金融排斥难以满足金融需求。”赵鹏进一步表示，“在这方面比较好的结合点就是数字普惠金融，坚持金融向善，用数字技术为群众提供可负担、更高效、更安全的金融服务。在促进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同时，也能够确保社会的公平。”

在监管方面，张为忠建议，相关部门要对整体创新持支持、包容的态度，同时也要确定好相关的准则标准。“这是一个动态过程，实操难度比较大，但好在我们一直处在运行的过程中。比如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国内已经有了相关标准，遵循这些标准，既能提效又能增效，还能控险。”

助力小微企业共享普惠金融成果

交通银行董事长任德奇在论坛上指出，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的普惠金融事业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主要普惠金融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受访者的账户拥有率、数字支付的使用率、借贷参与率等指标均有明显的进展。”任德奇说道。

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是普惠金融事业的重要一环，多位嘉宾在大会上讲述了自家机构在帮扶小微企业方面的一系列实践案例。任德奇表示，近年来，交通银行聚焦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专精特新”等重点领域，打造出了科创服务品牌。“比如，这次论坛期间，我们与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一起推出科技工坊，通过与地方数据的对接，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进行批量举证授信，使得客户经理像快递小哥一样，让客户简单扫码就可以有授信额度，简单快捷办理相关的授信融资。”

此外，渣打集团行政总裁Bill Winters还提到，集团和位于中国的一些技术公司进行了合作，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更好地沿着供应链深入到每个链上的参与方，让融资变得更加顺畅便捷。

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联席行政总裁廖宜建看来，融资难和融资贵是长期困扰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一个问题，而普惠金融是缓解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是要建设高质量的普惠金融体系，实现商业可持续性尤其关键。对此，廖宜建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

首先，持续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廖宜建指出，在内地，从国家到省到市都分别设立了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这对中小微企业融资工作有正向作用。目前来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体系的管理营运还需进一步完善，例如推动各级担保机构协同发展，完善再担

应链都在不断延长，如果把核心企业的供应链打开，不难发现其中有着无数中小微企业支撑着。“为此，汇丰积极推动智能供应链发展，以供应链核心企业的信用及相关业务数据来弥补中小企业的信用缺失，从而提高整个产业链中小企业的融资可能性。”

当然，普惠金融事业的建设过程中同样会面临不少挑战与风险，在穆迪评级全球副主席Richard Cantor看来，目前在数字金融的不少领域仍然存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比如，市场机构必须采取新的风险控制措施，来限制AI金融服务咨询的风险扩散。”



视觉中国图片

从管道式向制度型转变

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奏响发展强音

● 本报记者 黄一灵

东海之滨，黄浦江畔，上海这一片改革热土，在持续奏响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新交响曲。

在6月20日举办的2024陆家嘴论坛“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金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全体大会上，与会嘉宾认为，近年来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成绩斐然，但立足新的发展阶段，应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此同时，上海可进一步发挥对外开放“桥头堡”作用，在制度型开放上先行先试。

向制度型开放转变

一直以来，对外开放都是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近年来，金融要素市场互联互通加速推进，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和外资金融机构引进来络绎不绝，充分展现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积极成效。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金融行业制度型开放的稳步推进，包括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放宽外资机构和业务准入条件、扩大外资机构业务范围等。

摩根大通亚太区首席财务官兼中国区联席首席执行官何耀东表达了对外资进一步参与中国市场的期待。他说，未来期待金融监管部门在监管法规、市场准入要求及日常监管指标的制订过程中，继续充分考虑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的业务特点，逐步实现基于风险分析的“差异化监管”，进一步推动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健康发展，让其能为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贡献力量。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进一步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当下的必答题。业内人士认为，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金融开放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在不同时期对于开放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国金融市场开放一直以渐进式、管道式为主，在当前立足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强国建设目标要求之下，我认为以往由金融资源和要素流动驱动的开放非常有必要向制度型开放进行转变。”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党委书记霍颖励表示。

中国银行行长刘金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世界上各个金融强国都具有高度开放的特征，中国建设金融强国也必然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在规则、制度、管理、标准等方面，与高标准国际规则尽快接轨。下一步，稳步扩大金融领域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更多地从制度型开放入手。

多向发力推动建设

对标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我国金融市场目前还存在着差距。除持续拓展现开放渠道，优化规则机制外，业内人士认为，还应该立足国情，并从法治建设、风险管控等方面着手。

法治建设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根基。霍颖励认为，从金融市场开放的角度来讲，制度型开放非常有利于营造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保障境内外投资者享有同等的合法权益，依法保障金融市场活动合法合规进行。建议对标高标准的经贸规则，特别是金融领域的一些规则，精简限制性措施，增强开放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风险管控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底线。“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增强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控能力是金融机构自身经营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金融安全的要求。”刘金进一步称，既要放得开，又要管得住。在“引进来”方面，扩大市场准入的同时，要全面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在“走出去”方面，随着金融机构海外业务的拓展，关注跨境投融资渠道潜在的风险传导，强化对海外业务风险管理，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风险的应对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中国特色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方向。推进制度型开放应该从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況出发，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开放路径。在中国再保险集团总裁庄光志看来，要在制度型开放过程中积极融入和学习借鉴，也要在学习借鉴基础上进行融合创新。他表示，在全球化风险治理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应该发挥一定程度的引领、主导或者参与作用，通过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方面推进改革，另一方面服务好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双循环，为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作出金融应有的贡献。

上海期货交易所总经理王凤海透露，上期所正在谋划高水平、全方位的制度型开放，在中国证监会的统一指挥下，逐步对外开放。

推进上海先行先试

上海是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和重要窗口，也是金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头雁”。

近年来，金融业对外开放重点项目相继落地。例如全国6家新设外资独资公募基金、国内五大行参与设立的外资控股合资理财公司以及超过一半的新设外资控股券商落户在上海。上海还充分依托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金融开放创新先行先试优势，深入开展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资本市场。

刘金表示，上海自贸试验区已经成立超十年，贡献了全国近一半的制度型开放创新成果，是改革开放真正的试验田。要以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为载体，推进上海在制度型开放上先行先试，“未来，我们希望能够赋予自贸区更多改革创新的自主权。”

此前（6月4日），上海市委金融办常务副主任周小全透露，下一步，上海将从金融管道式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推进金融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包括进一步“互联互通”，筹建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提升国际再保险中心能级，创新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期货期权品种；进一步“对标对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在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升级、自贸区离岸债券发展等方面参与地方立法；进一步“增量提质”，修订《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提升金融中心法治化水平。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6月19日上午在2024陆家嘴论坛上还表示，要充分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推进更大区域范围内的高层次协同开放，鼓励上海依托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银行外汇展业试点，有序将上海的高水平开放政策复制推广到长三角乃至全国范围。